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追忆】	与蒋公南翔“会师”劳改场	王醒民
【荒唐岁月】	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丁大华
【劫后反思】	关于“文革思维”的几个问题	陈浩武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追忆】

与蒋公南翔“会师”劳改场

• 王醒民 •

一、坐机关的生活很乏味

工宣队要在清华搞“教育革命”，离开了青年人的参与，肯定热闹不起来。所以他们就在文革前招收的最后两届学生（一九七零年零字班和零零字班）的学生中精选了一些人留校工作。为了表示与“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工宣队将这批人命名为“新工人”。何其有幸！就这样，这些人早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多年进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

刚回到清华，学校就安排我为这批“新工人”作了一个报告，谈谈我在农村插队的体会。我所能讲的大体上也就是《煤油灯下写成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当然也免不了有即兴的部分。比方说，我提到在农村看到四、五岁的女娃娃在严酷的冬天，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地里往家背秫秸，小脸冻得通红，背上的秫秸比她们的身体要长出几倍，说看了令我落泪，云云。回到政工组后，一个同事的“新工人”委婉地提醒我注意，说是：“你在农村增强了阶级感情是一件好事，可是没必要对农村的贫穷说得太多，造成不好影响。”是的，她说得对，我应该多说“到处莺歌燕舞”。她本身也是来自农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所以她的名字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的痕迹，实在抱歉。

没过多久，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代表团访华，部分领导人到清华了解教育革命的情况。迟群、谢静宜亲自出马接待，开了个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准备向客人介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来客说：阿拉法特兄弟的访华日程排得太满，无法前来，表示歉意。经清华的代表们介绍了“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诸多毛病之后，来客中有一人就做出了一个提溜鸟笼的手势——显然他得到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的印象。临走前，他们向中方的与会者赠送了法塔赫的纪念章。记得纪念章的做工不是很精致，图案的中间是一杆长枪。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五十万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了造势大会。声明由林彪宣读。清华戴德慈代表红卫兵小将发言。会前，我们得为她起草发言稿，迟群指示：一定要把红卫兵小将的战斗精神充分表现出来，要对美帝国主义来个刺刀见红！

会后，我们又要到校园的各个角落里去收集反应，特别是文革批判对象的反应。我记得我去找过梁思成先生。他身体虚弱，卧病在床。他说：“毛主席真是伟大，一纸声明，胜过百万雄兵！”我回去向政工组组长胡保清作了汇报。他嘴角泛起一丝笑意，说：“这些老家伙们真会说！”

在政工组做文字工作其实是很乏味的，大体上是几个“笔杆子”坐在一起，按照上级的意思起草文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然后送上级审阅。我过去没有做过这样工作，也不喜欢这样的写作方式。我喜欢按自己的意思去写，自由自在地创造，而不是和一帮人组成一部写作机器。

我们写好的稿件首先要送胡保清审阅。胡保清的教育背景如何，我没打听。无疑，他算是海军里面的笔杆子。他很挑剔，但是又讲不出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他经常只是摇着头笼统地说：“这篇文章没有飞起来！”就是说，他觉得不过瘾。

徐葆耕常常笑呵呵地向他请示：“老胡，你给我们讲讲，怎么才能飞起来？”分明有调侃的意味。可是徐葆耕一片和颜悦色，态度谦恭，胡保清也就假装看不出来。

在起草关于教育革命的文件时，刘冰、何东昌也曾经参加讨论。在胡保清抱怨“飞不起来”时，何东昌口里吐着烟圈，瞪着一双大眼（何东昌的头很大，眼也很大）直盯着他问：“老胡，怎么才叫飞起来了？你能不能飞给我们看看？”对比之下，刘冰却总是比较沉默、低调、拘谨。

胡保清对何东昌也不客气，逮着机会，就要敲打何东昌一下。他对何东昌说：“你说学生跳木马跳不过去，却偏要他们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去跳，结果就摔伤了。你的言论是够反动的！”军宣队经常要提醒参加“三结合”的干部，不要忘了谁是清华的老大。何东昌也不接茬，像是无动于衷。

坐在办公室里闷得慌，只要有机会，我就往外跑。比方说，有时通知系里开会，本来打个电话就行了，我却宁可骑车跑一趟，当面传达到人。有一次在一个系办公室里碰到一个身材颀长，面目姣好的女兵。我进去时她正趴在办公桌上打盹，发觉有人来，慌忙站起，睡眼惺忪，撒着一双绿色的军鞋，可是脚上穿的却是闪亮的丝袜，绝妙搭配！她大概也觉得这样一幅模样被人看见不太雅观，慌乱地说：“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你的工作作风真认真！”其实我觉得她这副模样比起平时正经八百的样子要可爱得多。女人嘛，都是爱美的，应该是既爱武装又爱红妆。一双丝袜在一身军装背景的衬托下也算是一个亮点。

## 二、落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我在《圣人不仁，刍狗奈之何？》一文中详细地谈到了我对文革的真实态度和运筹“打回清华”的动机。通过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超乎寻常的努力，我实现了我的誓言，成功地回到清华。但是，不管我有多少自认为可圈可点的精彩行动，我却犯了一个大忌：我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一九六三年我到清华念书，我父亲送我去汉口车站。在路上，他嘱咐说：“以后凡事要多加小心，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句话我从话本小说上不知道读到过多少次，便认为不过是陈词滥调而已，也没把它放在心上。殊不知，这些千百年来被人说得“滥而又滥”的老话，凝聚无数人血与泪的教训！可悲的是，不到自己流血流泪的时候，我不能真正理解它。

我插队的村子叫四马营，最近的一个邻村叫八里庄。八里庄分去了两个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顾馨台和曹正中。两村相距不算太远，溜溜达达不过半小时也就到了。同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又都被分到农村插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慢慢就走得勤了起来。慢慢就说得多了起来。慢慢就说得深了起来。于是，便有大量痛苦的倾诉，大量不满的怨愤，以及大量对神坛的不恭。天高皇帝远，谁也不在乎几个插队知青，农村的黑夜保护着我们的秘密。

就在我插队的这一年，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先后下了农村。大弟弟是高中毕业，大妹妹是初中毕业，小弟弟实际上是小学毕业，在文革中混成了初中毕业。所以我们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比较彻底，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都下了农村。不久，大妹妹患了黄疸性肝炎，好不容易保住小命，可是此后身体虚弱，一至今日。大弟弟胃出了问题，医生说是胃溃疡。小弟弟来信说：白天蚂蝗吸血，夜里蚊虫吸血，真是难熬。我父母精疲力竭，穷于应对。我身为长兄，自觉有责任为家庭分担忧患。然而我在河北，他们在湖北，鞭长莫及。再者，插队期间，我们每月只拿十四元的生活费，其余由上级单位负责保存，不生利息。我买了一顶蚊帐寄给了小弟弟。年终，又将上级发回的钱全部寄回家为妹妹治病。家庭的不幸也让我的精神受到煎熬。

邻村插队的顾馨台家住北京羊肉胡同。有一次，趁农闲的时候，我们约好从插队的地方骑车回北京。我没有自行车，就向当地老乡借，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而是那种非常结实，但是非常笨重的土产品。我以为自己身体不错，可是七、八个小时下来，傍晚时分骑到顾家时，两腿僵直，都不会打弯了。

顾听说我大弟弟患胃溃疡，便说需要服用维生素U，还说他在北京医学院有同学，可以再去咨询一下。所以我就和他去了一趟北京医学院，见到几个学生，其中包括他的高中同学。从僻远的农村回到京都，回到一帮年轻的“臭老九”当中，顿时觉得有一种好像是回到家里的兴奋，晚上就山南海北一通神聊。我们插队，似乎有无穷的寂寞倾诉；他们待分，急于窥探以后的去向。越谈就越投机，越谈就越口无遮拦，突破了谨慎的界限。这些学生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陈毅元帅的侄子陈德春。由此，我就自然而然地谈到我对陈毅和“二月逆流”派的同情，谈到我对文革的不满和愤恨，谈到自己想混进党内，投靠“稳健派”反对文化革命的愿望。提到伤心事，潜然泪下，说到激昂处，也不管他是统帅、至尊、天王老子，恣意鞭挞，学了一回“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壮举。不过，不幸的是我忘记此时此刻已经不是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一个消受不起的奢侈。

看官，不用对我的言行进行更多的挖掘、追究，就我那一个晚上所说的出格的话，就足够为自己换回一项“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桂冠。我以后遭受的厄运，完全是我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正式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长达七年之久。说到“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至今还不知道是如何定义的。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这一称呼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你反对当时当权的

人，你就有可能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而且只要你戴上了这顶帽子，就很难将它摘下来。比如说，你反对林彪。在林彪倒台前，打你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没商量。可是林彪倒台以后，你未必就能翻案。当初林彪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看出来问题，你就看出来了？你比毛主席还高明？你当时反对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说到底，目的还是反对毛主席。所以你也别想翻案。“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这个大的覆盆之下，扣着多少沉冤！

特别吓人的是，曾经领导过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被揭露原来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老板！你说邪不邪！

倘若我在医学院发泄一通之后就返回乡下，在那里老实地待着，我想大家就会慢慢把这事忘了，认为只不过是一个对插队心怀不满的知青的胡言乱语。可是，不久之后，我又被调回了清华，并分配到政工组工作。这下子，我就不只是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而且有了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具体行动。于是，我变成了一条反革命的“大鱼”。听说，不管多么短暂，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闪光的机会。而这就是我一生中唯一被当成“大鱼”的光荣时刻。

我不知道北京医学院的那几个学生是怎样变成清查对象的。我只知道，他们在接受审查时，为了将功折罪，就揭发了我。从后来多次的提审中，我感觉到直接指控我的不是陈德春，而是一个叫张 GZ 的学生。

但是，不管是谁，我并不怨恨。我不谨慎，我做了蠢事。我挨整，我活该。

“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这条反革命大鱼被端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砧板的时刻到了。

那是一九七零年七月初的一个闷热的日子。下午一上班，办公室的小关就通知我去工字厅后厅见胡保清。进门一看，除了胡保清，还有一位长官：负责保卫工作的工宣队领导人柳一安。两人面色阴沉，示意让我坐下。胡保清，还是那样病容满面。柳一安满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透过他的眼镜，你会觉得他的眼白占据了眼球的大部。“青面兽”这个绰号一下子就浮上了我的心头。

“王醒民，你是有严重问题的。你必须老实交待。”胡保清没有浪费时间。

“我有什么问题？我不明白。”装糊涂，被审问的人最典型的反应。

“你去过北京医学院吗？”

“去过。”

“你认得张 GZ 吗？”

“认得。见过一面。”

“你们在一起谈过些什么？”

“聊天。我向他请教一些医学方面的问题。”

“你是有罪的！”柳一安单刀直入地插了进来，“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企图混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进行反革命活动！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我们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

我不认帐。

“显然你不能继续在政工组工作了。我们送你到汽车厂铸工车间去接受监督劳动，交代问题。”

胡保清的言辞相对平和、文雅，不像柳一安那样杀气腾腾。我敢断言，当年在清华整人整得最凶的就是柳一安。尽管他后来觉察到跟迟群、谢静宜走下去前途堪忧，转过身来和刘冰、惠宪钧、吕方正联名状告迟群，但是在迫害清华师生这一点上他比迟群、谢静宜更直接，更凶狠。迟、谢后来没有落得什么好下场，柳一安的结局也不值得羡慕。“人做事，天在看。”谁能说世上没有因果报应呢？

工宣队果然是雷厉风行。离开工字厅，就有人随我回到静斋，取了所有物品，押送我前往铸工车间去也。

说来惭愧，本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带的，寒酸得很。

当时害怕吗？肯定害怕。但是更多感觉到的是发懵，像是在做梦，梦游似地被人牵着走。居然还有些解脱的感觉，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了。有一次我碰到机械系零字班的周家琮和汲鹏等人。周家琮说：“《煤油灯下写成的报告》，你的那个标题早就给我一种不祥之感，让我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

我说：“我早就想离开那个地方了。”说的是真心话。

“那也不能以这种方式离开呀！”汲鹏急了。他说得百分之百地正确。我哑口无言。

铸工一去，就是八年。

八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青春能有几个八年？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

常宝小小年纪也知道八年苦难岁月的沉重，不堪回首！

但是，那毕竟是我生命中的八年，是我生命途程中的炼狱，我又怎能将它遗忘？为了能够比较集中地回顾一下我的一段特殊的遭遇，我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只对这八年的生活做一个蜻蜓点水似的涉及，然后再另开新篇专讲劳改的故事。

押送铸工车间之后，车间级、机械厂级的攻心会开了不记得有多少次，目的就是要坐实对我的指控。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让我感到最为恐惧的一次，是由厂军宣队负责人王忠主持的一次审讯。王忠主持会议，但是不唱主角。主角是一个形象十分威严的军人，我过去从未见过，此后也从未再见到过。除了柳一安曾经提出过的指控外，他又说了如下的两句话：

“你企图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的罪行是够得上枪毙的！”

这个新的指控立刻令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枪毙！”我相信他不是说着玩的。当时仅因“反革命言论”而被处死的，就大有人在。我深为赞赏的一篇文章《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就因遭到类似的指控，而被公开枪决。

我不能变成另一个遇罗克。

我回忆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对相当数目的人讲述过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副帅、旗手发表过大不敬的言论。在有可能遭到多人、从不同来源却可以相互印证的指控的情况下，我开始意识到：大事不好！我不可能蒙混过关、全身而退了。

我开始交代我的“反革命思想和言论”，但是对“企图暗害毛主席”的指控却下定决心死也不认。这个底线绝不可逾越！

对于负责审查我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得到足够的口供对我的问题作“反革命”的定性了。我在群众面前“彻底”交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时，他们还会打断我，大声呵斥我“借交代之名继续放毒！”

到了这个份上，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谁叫我成了反革命呢？

人真是贱。当你心中有宏伟计划、美丽憧憬时，你往往会心潮起伏，夜不能眠。可是到了穷途末路，万丈深渊时，却食欲旺盛、躺下就着。有厄运罩顶，连梦都吓得不敢光临。

### 三、与蒋公南翔“会师”劳改场

清华园这个皇家林园是块风水宝地。铸工车间又是宝地中的宝地，在工宣队看来有使坏人洗涤灵魂，脱胎换骨的神奇功效。在我去前，刘冰劳改刚刚结业。我去后不久，北京卫戍区又送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劳改对象：原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

就这样，我就有幸与蒋公南翔在劳改场会师了。

对用“会师”二字我心中感到很是不安。好像只有胜利的军队才够资格谈“会师”。小时候听说，当年“朱、毛闹革命，会师井冈山”，多威风！到了文革期间，又被告知历史真相是“毛、林闹革命，会师井冈山”，更威风！

今蒋公为“反革命黑帮”的将军级人物，我为“红卫兵”中一个叛变的小喽罗，都在政治搏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体无完肤，用“会师”二字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是不是啊？可是，一时也想不起什么好的、稍微能扫扫晦气的提法。那就请高抬贵手，让我这样用一回吧。

在劳改场和蒋公的第一次接触是一起筛沙子。在铸件冷却开箱之后，要将烤干、板结和混有溅出铁水的沙子喷水、筛净，再回收使用。我们的任务是用大铁锹把沙子铲到筛沙机的传送带上。

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从来都不觉得蒋先生的身体很好。文革开始以后，他被到处游斗，没少受罪，到铸工时已年近花甲，身体虚弱，站立和行走的时候，一肩高，一肩低，给人一种残疾的感觉。看得出来，来此之前北京卫戍区的监管人员觉得他缺少的是调教而不是调养。老先生干活非常认真，是一辈子养成的习惯。看到他干活时的那种艰难吃力的样子，我心中觉得不忍，便尽量自己多干一点，再把少量沙子推到他的脚跟前，让他多少也有点活干，意思意思。对于他的遭遇，车间里的工人师傅们心里跟明镜一般，也没人挑剔他。他们也常常出于好奇，半真半假地问他一些问题。问得最多的是他和他的妻子区棠亮的关系。他总是淡淡地回答：“她早就跟我划清界线了。”他也提到过“区棠亮不善于生活。”看得出来，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在干活的时候，铸工的工作服永远是黑不溜秋的，满是灰尘和汗水。老先生和其他人一样干活，一样身穿肮脏的工作服，脸上带着煤粉和汗水混成的黑色到食堂吃饭。但是由于他的年龄和特殊身份，又无法和普通工人混迹在一起，所以总是显得形影孤单，特别的寂寞。

那时候干活还经常要为革命加班加点，直到夜深。特别是在冬季，离开车间时，看见他那孤单而倾斜的身影在寒风中踽踽独行，渐渐消失在夜色中时，我心中就不禁涌起无限的酸楚和凄凉。

可是，这样一个虚弱的躯体里却隐藏着一个刚强的灵魂。

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他来铸工前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以下简称《奋斗》）。这是迟群、谢静宜主持起草的关于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由姚文元报呈中央。六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很好”，批准发表。这是迟、谢的得意之作。我在被贬之前曾在校机关看见过文章的校样，参加过定稿前的讨论，但是没有做过任何值得一提的贡献，不敢掠人之美。

在此九年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战线已经有过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高教六十条》，是由蒋公主持起草，并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由毛泽东审核批准的。毛当时欣慰地说：“总算有自己的东西。”

为了清算文革之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展示由他们主持的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迟、谢要用《奋斗》来和《高教六十条》唱对台戏。他们派人在铸工车间召开了一次对蒋南翔的批判会。会上他们要求蒋老先生对他们的杰作《奋斗》表态。显然他们希望蒋能识时务，对自己过去主持的工作来一番深刻批判，对迟、谢的革命杰作歌功颂德。

可是老先生偏不配合演出。他对《奋斗》几乎是逐条地作了驳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是“不现实的”，等等。

会议的主持者问：“你知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发表的？”

蒋答：“毛主席批示过的东西并不等于是毛主席自己的东西，也要允许批评。如果不允许，那《高教六十条》不也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发表的吗？为什么偏要说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呢？”

会议主持者：“……”。

老先生说话时斯文谦和，不疾不徐，好一副大知识分子的风范，他的对立面想发脾气都找不到茬。真乃“文林高手”。

精彩！能亲临现场目击这样的交锋，实在是过瘾，掏钱都没地方买票！

蒋老先生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表明：我爱毛主席，可是我更爱真理。

如果他多一点“变通圆和”，始终把党的“组织原则”放到第一位，他可能早就被“解放”，参加“三结合”了。

我们都是批斗对象。批蒋先生时，我要陪绑。批我时，蒋先生要陪绑。

蒋先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是满世界都知道，不需要介绍。我的“反革命活动”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的。但是经过多次、反复的批斗，也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蒋先生也知道我有那些“反革命罪行”。

我们不但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还要互批。我批他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了我。他告诫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共产党和毛主席产生动摇和怀疑。”

我们都是劳改对象，在车间里很少说话，切记不可公开地进行“反革命串联”。

但是，私下进行“串联”还是难以禁止的。

清华有问题的人太多了，不可能对他们每一个人都进行监视。再说，那个岁月革命群众身上的负担已经不轻，因此对“群众专政”的光荣使命也并不特别感到自豪和热心。人人做戏，捏着鼻子哄眼睛。我，一个青年学生，既无后台又无背景，反革命罪行已经充分暴露，谅你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们对我也就更加疏于监督。这就给了我可趁之机。

有一天晚上，我就偷偷地跑去见蒋老先生。

他住的宿舍楼里灯光暗淡，对面碰到人都难以看清面相，过道里摆满杂物，是那个时代平民百姓非常典型的居住环境，对进行严令禁止的串联活动十分有利。

为了这次访问，我特意准备了一个道具：一本很旧的赵孟孚的《雪赋》帖，以楷书写的是谢惠连的《雪赋》开始，后面还有行、草写的张衡和陶渊明等人的诗，是我从荣宝斋淘来的。同时我还准备好了一份说词：万一遇到意外情况遭人查问，我就说是来向老先生请教古文，因为我的特殊身份，确实无处可去，谁也不愿为我沾火星，惹麻烦。我和老先生处境相同，彼此彼此，就不存在这样的顾忌，云云。

推门进去，万幸，老先生一人在家。见我到来，老先生没有显出任何感到意外的表情，大概是因为荒诞之事见得太多了，见怪不怪吧。

我随手翻开字帖，那一页写的是张衡的《归田赋》：“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老先生连忙说：“对碑帖我不是很了解。”我说：“我是想请教一些古文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开始谈开了。由古文开始，谈到《奋斗》与《高教六十条》。老先生给我讲述了《高教六十条》形成的过程，特别强调那也是经过毛主席审核、批准才通过的。

我谈到清华的许多师生都认为蒋南翔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是被揪出来的，而是被抛出来的。我说，我在高教部的批斗会上看见清华学生和揪斗他的人进行辩论。“你也去了？”老先生很高兴。在那次批斗会上，我看见老先生在被揪的时候还敢挣扎、反抗。可是到后来在主楼前陪王光美挨斗时，他就不再挣扎了，学乖了，知道挣扎也无益，越挣扎，越受罪。

我谈到清华有个叫黄报青的教师，坚持认为蒋南翔“姓马”不“姓修”，最后跳楼自杀，以身殉蒋。我与黄报青从未谋面，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耿直、刚烈不亚于中国古代的义士，非常值得佩服。老先生听罢，神情悲怆，长思不语。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又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我心里有个潜台词：“老先生，黄报青是为您而死的，有朝一日，如果您有这个机会，一定要为他洗刷冤情。”

老先生没有忘记这件事。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六日，清华大学党委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黄报青、刘承娴、周寿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蒋南翔送了花圈。这些人最终得以平冤昭雪，可是他们亲人心中的伤痛却永难平复。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和蒋老先生在一起劳改了四年。我曾偷偷地去找过他多次，和他谈论过很多问题。我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他内容整理如下。

我们由文革期间的整肃谈到历史上的整肃，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落水者运动”。他说：当时中央的估计是，敌我双方的斗争激烈、复杂，国民党向解放区派遣的特务所在多有，不足为怪。结果延安根据地所有的机关都千方百计地抓特务，硬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他说，他当时也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的，搞得上吊的上吊，跳崖的跳崖，伤害了许多的好同志，结果是一个特务也没有抓到。所以他就给中央上书，说以后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我说，您那时也就三十岁，也是年少气盛，仗义直言，胆子也真够大的。

关于清华的招生路线问题，他说：在报考清华的学生中，如果有考分达到录取标准，而因为任何其他原因妨碍录取的，清华派出招生人员不能自行做主，必须上报清华校党委讨论决定。他说，有些特别优秀的考生报考了机密专业，但是家庭出身不合格，招生人员有顾虑，认为这些人没有密级，将来肯定分配不出去。当时我就让他们先收进来再说。将来如果真的分不出去，就留校任教。在我担任高教部长期间，我可以肯定地说，清华录取的学生质量是全国最高的。在招生的问题上，我们基本上没有开过后门。就我所知，我们就照顾过叶飞的女儿，因为她是华侨。

铸工的工作环境是高温、高强度、高粉尘、高噪音、高排放。铸工的活又脏又累。有工人师傅说：“我们的肺都是黑的。”我们每天干完活都得淋浴。老先生用热水洗净身体后，又突然将热水关掉，将冷水开到最大，猛冲身体。有时也会溅到旁边人的身上，冷不防给他一个激灵。他说这是当年做学生时从马约翰先生那里学来的。这种由热骤冷的刺激有益于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我说：我从谷岱峰著的《保健按摩》中读到，眠、食为养身之两大要务。他说：养身应该有四大要务：眠、食、动、息。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钦定的、甚至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叛逃失败，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国政局发生的剧变震惊了整个世界。在此以前，毛泽东殚思极虑，对处理林彪的问题做了周密的部署，以为林彪会像以往诸多被打倒的对象一样，俯首就擒。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有料到林立果和他周围一些少壮派军人完全不按他预想的常规出牌，作出了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选择。统帅受伤不轻，文革败象毕露。上层领导陷于极端的混乱，如何收拾残局？怎样向天下人交代？林彪摔死了多日，报纸还在施放障眼法，把毛、林放在一起歌颂。

我虽然在接受劳动改造，可是我有很多要好的同学和仗义的朋友，所以我的消息并不闭塞。大约是在九月十六、七日下午，机械厂的“新工人”铸零零班的孙礼照同学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告诉我：中央出大事了，林彪企图政变失败，坠机身亡，各大军区都被卷入。

我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局势居然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剧变。喜的是我的罪名至少可以洗去一半。我欢迎任何能够促使文化革命早日结束的变化。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夜幕刚一降临，我就骑车到蒋老先生宿舍，向他报告。听说此事，老先生非常激动，连声说道：“共产党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稍停一会他又说：“林彪的那个五·一八讲话谈的就是政变，很不正常。共产党里不应该出这样的事情……”。

说出这个消息，我就赶紧离开。非常时期，不宜久留。

在随后的日子里，周围的气氛怪怪的。老百姓都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情，可是没有官方的正式通知，谁也不敢随便乱说。而高层在混乱中一时也找不出合适的方式自圆其说。这种诡谲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国庆节。

当时在铸工车间接受改造的除了蒋老先生和我之外，还有一个在七·二七工宣队进校时打死了工人师傅的学生廖光黔，一个旧社会当过舞女的职员陈瑛。凡是逢年过节，或是有重大的政治或者外事活动时，我们这帮“牛鬼蛇神”就会受到警告：不许外出。那个特殊的国庆节更是如此。我们的监管人员不想让我们闲着，就安排我们清扫八号楼的厕所。看到蒋老先生扫厕所，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造孽啊！堂堂高教部长，中央候补委员，竟然受到这样的屈辱！”他却没有任何异样反应，看来早已习惯。

扫完厕所，收工回家之前。我们的监管人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段时间的思想动态。想必是因为非常时期，厂工宣队的负责人索中和和厂长白鸿烈居然亲自出马。我们围坐在八号楼西面门外的地上开始汇报。我不记得自己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是肯定说过要改正错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干革命。上面没有人告诉我林副主席叛变了，摔死了，我哪敢忘记林副主席嘞。

蒋老先生没有说任何废话，开门见山：“这几天看报纸，没看到国庆社论，总理也没有出席国庆招待会，很多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露面。这很奇怪，很不正常。是不是中央出了什么事情？”

在场的人中间，只有他当过高教部长、中央候补委员。“正常”、“不正常”，也只有他最有资格判断。

索中和、白鸿烈无言以对。沉默。场面尴尬。

不过没关系，老先生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国庆节后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当局终于决定向一般群众，当然不包括我们，传达林彪事件。也真为难了他们，林彪的故事怎么才说得圆哪！“571工程纪要”真是一个振聋发聩，让人大开眼界的文件。不发表，无法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发表，会引起无限的联想和质疑，后患无穷啊。文化革命的大厦开始倾斜。我盼望它早日坍塌。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为了自圆其说、不给文革的反对派以可乘之机，并且将文化革命继续推行下去，又发动了批林批孔、反儒尊法的运动。在车间学习的空闲时间，我向老先生请教过关于商鞅变法的一些问题，问“作法自毙”这个成语是否源自于商鞅的结局。老先生说：法家的那些代表人物都是一些朝秦暮楚的角色，不值得称道。

林彪的倒台为很多老干部的复出提供了转机。蒋老先生也被列入考虑“解放”的对象。但是获得“解放”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是要承认曾经犯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要

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解放全人类的广阔胸怀对自己进行挽救，要保证洗心革面，从此永远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老先生非常固执，不愿认罪。上面感到非常棘手。你不认错，叫我如何解放你？你没有错，难道是我错整了你不成？难道要我先向你赔礼道歉不成？岂有此理！

上面组织了一批人，包括一些较早获得解放的清华领导干部，多次开会蒋老先生进行批判、教育、启发，帮助他提高认识。可是老先生的悟性好像突然间急剧下降，就是领会不了，觉悟提不上去。解放之事只能一拖再拖。

一九七三年，老先生六十岁将临之时，情绪低落，悲叹：“老之将至”。那是我仅有的一次直接从他嘴里听到了悲怆的流露。

迟群也没有忘记老先生年满花甲。他在一次会议上讲：“有人说：清华的事，年纪不到六十的人是管不好的。蒋南翔就正好是六十岁。这不是要请蒋南翔回来，要复辟吗？”

对老先生的批判帮助会开了多少次，老先生的觉悟最终提高到了那一步，双方究竟达成了何种妥协，这些我都无法知晓——怪只怪他们没有请我列席，我也不敢编造。

一九七四年九月下旬的一天，蒋老先生对我说：“我想请你下班以后到我那里去一趟。”

晚上我去了。老先生递给我一份文稿，说：“你的思想比较……”，老先生有点窘迫，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我想请你帮我看看这份发言稿，看合适不合适。”

接过一看，原来老先生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即将获得“解放”。他必须在宣布“解放”的大会上做一个发言，再次忏悔自己的错误，感谢毛主席的挽救。

我仔细地读了两遍，沉吟片刻，然后说出了我的意见：“我觉得您的发言稿写得很好，内容丰富，条理清楚。但是有一点不足：过于理性，而感性不足，没有充分表达出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显然，老先生对当时流行戏剧的要素不够敏感。

老先生点了点头。

国庆节前夕，老先生得到了“解放”，据说当时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车间里传达了蒋老先生获得解放时的情况，说老先生在会上发言时非常激动，当回忆起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他的时候，流下了热泪。

我在心里欢呼：“蒋校长，干得好！”

#### 四、老校长秉公仗义为我昭雪

蒋公离开铸工车间之后，我也没有特别留意他的去向。人生本无常，聚散何依依！劳改的日子照旧进行。说实话，那时候连日子都懒得去记。

一晃又是两年。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四人帮”垮台，万众欢腾，普天同庆。

为什么？老百姓实在是憋屈得太久了。中国人的生活是该改变一下子了。

理所当然，我希望我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我请求对我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那些经手处理过我的“反革命”案件的人反应冷漠，甚至告诫我：“不要以为四人帮倒台了你的问题就没有了。”

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时来运转。人说“耐心是一种美德”。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四人帮”倒台后，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我又敢记录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幸运的是，我在那一段时间的笔记居然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以下的叙述就有据可依，更加准确和具体。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我的宿舍里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力八零三班的祁力群同学。我们同一个专业，他比我高一班，是清华大名鼎鼎的“万字号”的学生。清华的学生可以说是全国各个地区的状元，而“万字号”的学生则是清华大学万里挑一的学生，是凤毛麟角的尖端。他说：

“南翔同志多次嘱咐我到清华来看你。他很关心你。他希望清华党委能为你平反冤案，安排工作。我到你这里来之前先去找过何东昌同志。他说：‘王醒民的思想够反动的。’我向南翔同志做了汇报。南翔同志说：‘我跟他一起待了四年，我了解他的情况。你再到清华去，说我的意见还是平反冤案，安排工作。’南翔同志还请李寿慈同志具体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准备好申诉材料，尽快去拜访李书记。”

人世间有一种可以震撼灵魂的感动。一个人一生能有这种体验的机会是不多的。那时候我体会到的就是这种震撼灵魂的感动。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依然难禁热泪。

我立即着手准备申诉材料，并写了一封给老校长的感谢信。十月十二日晚上我登门拜访了李书记，请他向校党委呈递我的申诉并转交我给蒋校长的感谢信。李书记为人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对我的努力进行了鼓励，并且告诉我：刘达校长已经下决心解决落实政策的问题。清华遭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数以千计，要推翻结论，重新审查。

十月二十二日晚上，我再次拜访了李书记。他说：申诉材料已经转交林克和黄光同志。林克同志是原南京工学院的书记，黄光同志是北京市化工局的领导，他们现在具体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南翔同志尚未回京，等他回来后，再向他汇报你的情况。你要耐心等待。

在我遭难的这些年里，有一位同学从来没有和我断绝过联系，而且竭尽他的努力来关心我、帮助我。这就是我的好友，土建系给零班的马雨农同学。那时候他在光明日报当记者，消息灵通。得知蒋校长关心我平反的事，雨农为我感到高兴，并时时注意事情的进展，给我提供宝贵的支持。

十一月十一日晚上，雨农告诉我蒋校长已经调回北京。

十二日下午，雨农又请他的亲戚通知我给他打电话。我在五点左右才接通他的电话。他告诉我：蒋校长确实已经回到北京，并且已经开始工作。他告诉我蒋校长的办公地点，说他的秘书是张宏志，可打国家科委电话 8 6 — 8 3 6 1 转南翔同志办公室。

十三日，李寿慈书记告诉我蒋校长回到北京，并建议我去看他。下午我就去找雨农商量如何去见蒋校长。以下是后来我对这次会面所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记录。

十四日上午九时，我与雨农在玉渊潭电车站会面，一起到国家科委去。南翔同志的办公室在二楼五十二号房间，房门紧锁。我们就到秘书室去，问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南翔同志是否在他的办公室。答曰：“领导同志的事，我也不知道。”雨农又问：“南翔同志今天是否会来？”那人就打了一个电话：

“南翔同志吗？  
《光明日报》有两位同志要见你。  
不见——？”

我们要求和蒋校长在电话里讲几句。那人请示：“他们要在电话里跟你讲几句话……”

我接过电话，说：“蒋校长吗？我是王醒民。”

“王——？”

“我是王醒民。”

“哦，王醒民！你在城里吗？”

“我现在在科委，我想找您一下。”

“你十一点来吧。我住在友谊宾馆，北二号楼 5 2 0 8 房间。”

“您方便吗？”

“你们来吧！”

“好吧，谢谢您。”

我们于十点四十五分到达友谊宾馆。传达室与南翔同志通了电话，吩咐我们先到 5 2 1 1 号秘书室稍候。张秘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南翔同志正在和李昌同志谈话，让我们稍候。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南翔同志在高教部时的秘书，前几年在石景山的一所中学教书，已经四十五岁了。

过了一会南翔同志进来了，和我们握手。我们向他问好。他穿一件旧的蓝色上衣，灰布裤子，比过去略显清瘦，但是气色很好。我向他介绍了雨农，并告诉他雨农是丁雪松同志的女婿。他说他和丁雪松同志比较熟悉。他说他曾多次想打电话找我，可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我，所以他才委托祁力群去找我。他询问了我的近况，我做了简单的汇报。他嘱咐我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要积极。过了一会，张秘书进来说李昌同志要走了。南翔同志出去送客，转来后又继续询问学校的情况。将近十二点时，谈话结束。南翔同志吩咐张秘书招待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出来以后，雨农找到了他们报社的同志，一起到食堂进餐。

回学校以后，我给南翔同志写了一封信，为自己事先不打招呼就唐突造访道歉，并感谢他的亲切接见。

由于涉及的人数很多，工作量大，环节琐碎，学校里落实政策的工作进展很慢，拖的时间很长。我纵然再是心急如焚，也只能耐心等待。具体经手解决我的问题的是谢宝栋、王乐铭（直到十几天之前，也就是二零一四年二月六日，我才知道他是刘达校长的秘书）和王文

选（音）。中途谢学长因心脏破裂突然去世，进程又受到影响。一直等到一九七八年，我的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

学校早在五月二十二日就作出了平反结论。但是我直到七月十二日才看到这个结论。七月十四日结论正式宣布。我将结论最关键的部分摘录如下：

“经复查：一九七零年王出于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的不满和义忿，发表了一些言论，原结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等，系属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与此同时，在某些问题上，王由于不能正确区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讲了一些不妥之话，属于认识问题。据此，决定撤销一九七零年所做结论。”

至此，王醒民在20世纪70年代的“八年抗战”宣告结束。

在这八年中，我和我的国家、人民经受了巨大的创伤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我是一个幸存者，可是有多少人被这场浩劫吞噬！

平反之后，我在第一时间向蒋校长、李书记、何书记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表达了谢意。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因为任何个人的问题去打扰过任何一位领导同志。

我又站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此后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前途自己去创造。

不久之后，根据我的请求，我被调回自己的专业：电子系软件专业。九月二十日，我在机房上机时，正好碰上蒋校长、李寿慈书记到系里视察工作，和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们给了我张宏志秘书的电话号码86—2092，让我有事去找他们。

一九七九年，我考取了软件专业的研究生。一九八二年，经过非常艰难曲折的努力，我争取到自费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在出国人员集训期间，去拜访了蒋校长，向他辞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曾问他：如果将来再出现文化革命怎么办？他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民主意识。

因为我即将出国，他给我留下了这样的题词：

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不断前进。

蒋南翔

1982.5.29

拜访结束时，他送我到门外，还特别嘱咐说：“要特别注意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我们党的正确的经济主张都是由陈云同志代表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校长。

同一天下午，我还到清华去拜访了罗征启老师。他是清华的领导，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更多的是一位宽容、坚毅的师长，一个真正令我仰慕的清华才子。

## 五、蒋校长，我永远怀念您

蒋校长是一九八八年去世的。我非常怀念他。他是一个渊博、谦和的知识分子，又长着一身铮铮铁骨，在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他是一个目光远大，卓有建树的教育家，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慈祥长者。这样的领导干部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我无法报答他对我的大恩大德，只能遥望故土，寄以无限的感激与怀念。令人伤心的是，我甚至没有能力找到合适的文字来表达我的这份哀思。蒋校长已经故去，可是我宁可相信他的生命并未结束，而是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从那里看，我们这个人世的真实和虚伪都一目了然，无法遮掩，我们能够表达和无法表达的情感都同样能够得到理解。

带着这样的一种欣慰，让我就此打住。

蒋校长，我将永远怀念您。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三日，于拉斯维加斯

作者王醒民，生于1945，1969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1986数学博士，现住拉斯维加斯。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荒唐岁月】

#### 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 丁大华 •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 ◇ “林办”指示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

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

《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里，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 ◇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席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

“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赔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

“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兢兢，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 ◇ 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像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 ◇ “耀眼”的历史缩影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等材料，并展出了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极力美化。但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这家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当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较高收藏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级大户”。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 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原来，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而且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我党与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许多重要领导都“靠边站”、很难找到主要领导敢于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极强的情况下。是极难得的一次“请示”机会。恰巧那天晚上，我们第四馆主管业务的红卫兵小将因从未接触过如此重大场面，高度紧张，转瞬之间竟把该问的问题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急得直跺脚，还掉下了眼泪，这才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

进入会客大厅，只见一片灯火辉煌，在新闻电影制片人员耀眼的强光灯照耀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与到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馆领导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们”保健极为出色，个个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几乎每位“首长”脸上连一条皱纹都见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颜鹤发”的神态。特别是最后进来的江青，时年已近60岁，但红光满面，脸上找不到一条皱纹。为验证我的视力，我当时特地把到场的、血气方刚的、经常游泳的红卫兵小将与“首长”面色作了近距离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的脸色能与“首长们”相比的。

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说：“是啊，我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了不起啊，各国反动派都害怕呀……”并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请他们帮助

解答。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有关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接见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安排。

深夜，当我们将上述情况和康生的“指示”电话通知中联部有关同志后，他们立即回电话，让我们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指示逐字逐句转达给他们，并立即召开了部长联席会议。一再嘱咐我们，第二天一早一定带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时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记录文字材料去中联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实首长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整理记录文字。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 原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1期

~~~~~

### 【劫后反思】

#### 关于“文革思维”的几个问题

• 陈浩武 •

一九六六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把当年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起点，至今已有48年。对于这样一场人类浩劫，我们至今对它还没有一个认真的清理，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

当然，在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主政时期1981年，中共中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曾做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对文革做了一些历史的评价，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积极的。但是出于历史的政治局限性，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历史决议是不够的。这份决议，对毛的清算，对文革的清算，都远远不够。特别是对毛要为文革所承担的历史责任，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认识高度，而是把文革的罪恶非常不负责任的推给什么“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决议，也逐渐被淡忘掉，今天，当局似乎在有意识地屏蔽和淡漠这段历史。其实屏蔽和忘却这段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如果真正从对历史负责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不能够屏蔽或忘却这段历史的。

我今天想讲三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文革思维？我们需要对它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有个定义；第二，文革思维的思想源泉，文革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一个登峰造极的荒谬境地，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要对这个历史原因做一个分析；第三，文革思维对今天社会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清理文革思维？这个清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从社会层面看；另一个是我们每个人自身都要清理。第三个问题其实是讲反思文革思维的现实意义。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文革思维？

一，文革思维就是一种邪教思维。

什么是邪教？凡是崇拜活着的人，把活着的人造成神，这就是邪教。

文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造神运动。我们知道，文革之始，就是造神之始。文革开始的时候，对毛的崇拜已经狂热，把毛比喻为红太阳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每天早上广播，第一首曲子，就是《东方红》。这首由陕北民谣改编的歌曲，赤裸裸的把毛比作太阳：“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把一个活着的人比作太阳，公然称赞他是“救星”，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少有。就是封建王朝历史上的皇帝，也没有这么称呼的。更何况是以“为人民服务”相标榜的中共党人！一个活着的人成为人民的救星，人民就只有把他当神来崇拜。每次开会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造神运动在文革期间达到无以复加的状态。到处是《红宝书》，到处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本人的巨幅相片组成的“红海洋”。《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据说印刷了有几十亿册，到处散发传播。

与造神运动相对应的，是对广大民众的洗脑。大家知道，那时强调“灵魂深处闹革命”，强调“精神原子弹”，强调“忠不忠，看行动”。同时要“早请示，晚汇报”。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感。我记得那时吃饭，要拿着碗，先排好队，给毛主席请示汇报。其实不是对毛主席，就是对毛主席的画像。然后在街上大跳“忠字舞”，讲“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其实就是把人造成神，这种造神运动就是一种邪教思维。

我前面说到，邪教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崇拜活着的人。

为什么崇拜活着的人就是邪教？很简单，因为人是有限的。宗教信仰之所以存在，神性之所以存在，都是基于人的有限性。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神，就是人的有限性。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限。无论是个人的精力，生命的长度，还是对世界问题的判断和看法，或是个人经验的积累，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它都是相对的，是有限的。如果不承认人的有限性，把人夸大为无限，甚至把人变成神，这本身就是一种灾难，一种邪恶。

文革造神运动把人变成神，那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首先把原来“神”消灭。即消灭中国人原来的精神信仰。文革这种造神运动的开始，就是剿灭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要造一个人间的神，就必须把传统的神颠覆和剿灭。所以文革一开始的所谓“破四旧”，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基本主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革期间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和毁灭。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五千年的文明史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和传承功能。如果把这些东西剿灭，就是挖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所以邪教思维的造神运动首先是否定中国的传统的神，传统的信仰，传统的宗教，传统的文化为前提的。它的邪恶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把有限的人造成神，第二，是把真正的宗教信仰，精神信仰颠覆，铲除，毁灭。

我们今天中国陷于一种精神的危机，陷于一种道德危机和信仰崩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革的造神运动。因为造神运动把毛造成神，造成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形象，并用其颠覆了传统文明。所以今天当毛这个神像坍塌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彻底坍塌了。

二， 文革思维就是在正义和革命的名义下作恶。

我们今天重新看文革，可以说是恶行累累。打人，杀人，放火，抄家，武斗，各种各样的事情，荒谬绝伦，恶行累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认为这是恶性，但为什么当时能够在神

州大地肆虐横行，因为当时的恶行都是打着革命的名义，打着正义的名义，打着人民的名义在进行。所以在当时，这些所行之恶都赋予了它的一种神圣性、一种不容置疑性。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的参与者——红卫兵，在当时来讲都是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是学生。这个年龄对男孩来讲还是童稚未泯，对女生来讲还是花季少女，应该都处在人类最善良、最纯洁，最可爱的年纪，为什么他们一夜之间会变成豺狼、变成作恶多端的人呢？

我们看到文革的这些回忆，还记忆犹新的一幕，一个女孩穿着军装拿着皮带，用皮带的金属端一下就把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眼球给打出来了。这种残忍、这种暴力、这种血腥为何在当时得不到制止呢？非常简单，他们的这种恶，是在革命旗号下的恶。

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文革开始初期，这种意识形态它激发了人性的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在当初最流行的口号就是——“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那么既然是革命，这个革命就包括很多恶行。比如说打砸抢、比如说抄家，但名义上打着旗号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那么就赋予了这种恶行的某种神圣性和正义性。

当初的毛主席语录被贴在大街小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花说话，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比如说，那个时候提倡学雷锋，学雷锋包括好几个方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待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比如说，那个时候整天给人灌输的是阶级敌人是要复辟，说当初无产阶级所镇压的这些地主富农他们要变天。如果变天，那么我们无产阶级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再比如说，在当时的舆论指导下，就是要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统统都在打倒和焚烧之列，那么这样一种思想的灌输，武装了当时的年轻人，也就是红卫兵，他们在以革命、人民的名义下来进行这一系列的恶行就显得非常的合理。反而任何的善良、同情、正义、怜悯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都与革命是格格不入的东西。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之恶的激发是意识形态的激发，是在革命与正义的名义下使人的恶得到了激发。

### 三， 文革思维就是斗争思维

文革是中共的阶级斗争理念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毛反复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争行吗？”

要斗争，就必须有斗争对象，就必须有敌人。如果没有敌人，就要制造一个敌人，然后斗争他。因为只有斗争，社会才能发展，才能进步。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逻辑。

斗争思维产生暴力意识。

因为要斗争，就崇尚暴力，崇尚残忍，崇尚血腥。就践踏规则，践踏法制。

任何社会秩序都一定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法制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没有规则。但是毛本人就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

种思维的惯性与当时的社会状态。当时的红卫兵在文革期间的打砸抢的行为和当年的义和团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任意的去剥夺人的自由与个人权力。

严格的讲，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打人抢劫，杀人犯火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当年在武汉看到所发生的武斗，那种血腥与暴力，互相残杀，打死人之后的扬长而去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们认为打的是坏人。这种完全践踏规则与法制，完全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文革思维的重要特点。

林达的一本书中写到，美国有一个90岁的老太太叫汉道克，她为了呼吁改革进行的经费，独自一人横跨美洲大陆、跋涉了5千公里，抵达了华盛顿。因为沿途有媒体造势，当她抵达华盛顿时可以说是举国欢呼、万人空巷。可是当这个老太太进入国会掏出演讲稿的时候被警察逮捕，原因是法制规定非国会议员不得在此发表演说。因此即使这个老太太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她违反了法制，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老太太在最后一刻遭到了逮捕。所以行为的正义和承担法律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为应该是正义的，但所有行为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才是法制社会，文革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多恶行，根本原因就是它践踏了法制和规则。这点对今天的社会状态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我们推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由于缺乏对规则的尊重、对契约精神的尊重而混乱不堪。

#### 四，文革思维就是反人性，鼓吹暴力

之前提到文革期间在革命和正义的名义下作恶，这种恶行肆无忌惮，并逐步演变成一种残忍血腥的暴行。因为在当时把一切仁慈、善良全部归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全部都归为革命的立场问题。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暴力环境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制下继续革命”这种口号，完全导致了人性的堕落和泯灭。在文革时期发生的这种事件，包括1968年在北京大兴的屠杀事件，和1967年湖南道县的屠杀事件都是非常血腥和残忍的。

我看过一个资料，讲述北京大兴县的事件，即使是离北京这么近的一个区域居然可以发生那样大规模的对地主、富农份子及其后代的残忍的屠杀事件。当时有一个老太太抱着他孙子，一起就被红卫兵直接活活埋掉。那个小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觉得不断扬弃的尘土扎眼，他说：“奶奶很迷眼”，老太太对孙子说“忍耐一下，待会就不会迷眼了”。所以说那时对老人和儿童的屠杀是非常残忍的。湖南道县所发生的屠杀更加惨绝人寰，当时从河流上游漂下的尸体成连成片，导致下游人们完全无法饮用水，还是当年一些有良知的人把尸体从河流中打捞上来。

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中，有一节讲到道县的大屠杀——

#### ◇ 道县事件的活证人

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那场大屠杀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被称为“彬州道县事件”。三大队有四五位道县事件的活证人。一位是我同一组的姓何的农民。他平时极其老实，对人总是低眉顺眼，笑脸相迎，对上司的命令总是绝对服从，从不反抗，象一个顺从的奴隶。但他象没有魂，行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傻子”。了解他的犯人告诉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县事件中全被“贫下中农法庭”杀害。杀害的手段极其残酷。民兵用枪逼着他父亲亲手活埋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然后命令他父亲给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

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阶级敌人”。城里造反派把共产党组织冲垮后，很多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就跑到乡下，动员支持共产党的人组织了“贫下中农法



庭”，屠杀“阶级敌人”，以防止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四个“道县事件”发生在1967年8、9月保守派在城里失势的时候。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两三千“阶级敌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过这场大屠杀的。由于受了极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发一次疯。有天夜里，我上厕所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厕所大声吟唱，象和尚作道场时念佛经。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里上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转过背前后走动，边走边挥舞木棍，念经的声音时高时低：“大道，苍天，不杀，不负。神天有眼，道行道归。”我走过去轻声道：“何呆子，你该去睡觉了。”他一反平常对人和顺的态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经。舞他的。我断定他在发疯，只好回监房去向其他人求助。了解他的人都讲，这是因为他被大屠杀吓疯了，每个月总要发几次疯，没办法治，让他去。过两个小时他自然会恢复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经起来了，表情和平时一样，和顺与谦卑，脸上再也没有昨夜的杀气。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发疯时讲了什么当局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而做牢的。

另外一位“道县事件”的证人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杀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宝，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邱宝健壮得象头小牛。有天在监房外边的养猪场劳动时，看到公猪和母猪正在交配，来了“神”，裤子都勃起来，他站着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围的犯人都大笑起来，向他起哄：“邱宝，站起来呀，又不是大便，蹲着干什么呀？”“邱宝，又不是要你配种，你来什么神呀？”邱宝三代贫农出身，道县事件前，爱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儿。这女孩子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以后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只嫁给地主的儿子。女孩子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全被拒绝，并被告知非地主的儿子不嫁。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会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种残忍与暴力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所以在革命的互相竞争中就变成了一种残忍的比赛、血腥的比赛、暴力的比赛，那么谁更左、谁更残忍、谁更血腥、谁更暴力就变成了谁更革命的一种标签。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鼓舞下，惨无人性的事件就愈演愈烈，把人类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的底线无限制突破。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之惻也，这说明恻隐之心是人类的起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不能够有同情、不能够有良知、不能够有伦理、不能够有恻隐，这种思想是被革命者不能接受的人性论，要把它批倒批臭。

## 五，文革思维就是奴性思维。

奴性在中国有很深的传统，但是文革却将奴性发展到一种极致。这种奴性思维有几个表现：一个就是绝对的拥护和绝对的盲从。在忠于领袖的口号下，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消灭了自己的思维；

第二个就是一切要求统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所有的价值观；

第三个就是没有基于客观理性正义的独立思维，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去盲从。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一切独立、理性的思考采取残酷的打击。比如说张志新、遇罗克、杨小凯，在这个年代能够反思之人都遭到了灭顶之灾，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放弃了这种理性的思考、独立的思维而决定盲从。一直到今天这种奴性思维在社会上还有非常多的痕迹。我们经常看到的标语就是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规章等等。所有一切都统一，使社会不再是多元化的，统一恰恰就为独裁与专制创造了条件。对那些独立思考的人不是出于尊重而是蔑视，导致这种

盲从的奴性思维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核心就是因为造神意识的背后蕴藏着邪教观念。

奴性思维，表现在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的堕落。

文革期间，大师级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

□ 原载陈浩武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